

李英姿 著

传统与现代的变奏

——《论语》半月刊
及其眼中的民国

齊魯書社

本书获得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江苏科技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

李英姿 著

传统与现代的变奏

——《论语》半月刊
及其眼中的民国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与现代的变奏:《论语》半月刊及其眼中的民国 / 李英姿著. — 济南:齐鲁书社, 2012. 11
ISBN 978-7-5333-2688-3

I. ①传… II. ①李… III. ①期刊—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0845 号

传统与现代的变奏

——《论语》半月刊及其眼中的民国

李英姿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 / 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69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688-3

定 价 31.00 元

目 录

序	1
前言	1
引论	1
第一章 《论语》半月刊的发展历程与幽默文化	28
第一节 《论语》半月刊的时代背景	30
第二节 《论语》半月刊的发展历程	37
第三节 《论语》半月刊提倡的幽默文化	79
第二章 《论语》半月刊的特色、群体与经营	106
第一节 办刊特色与作者群、读者群	106
第二节 《论语》半月刊的经营与发展	139
第三章 《论语》半月刊的政治观	166
第一节 对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伦理政治的态度	166
第二节 反对造神运动	
——对南京国民政府构建符号和仪式政治的态度	
.....	178
第三节 官僚是“中国的钻地虫”	
——对南京国民政府官僚政治的态度	190
小结	202

目 录

第四章 《论语》半月刊的文化观	209
第一节 “吾恨不曾为及门弟子而与之谈天说地耳” ——对儒家文化的态度	209
第二节 “中国人本是最艺术的” ——对民间文化的态度	215
第三节 “一团矛盾” ——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226
小结	244
第五章 《论语》半月刊的妇女观	249
第一节 “态自天生,非可强造” ——对城市妇女装扮的主张	250
第二节 “把握好分寸” ——对男女交往的主张	255
第三节 “只有结婚,才能给女子以解放” ——对城市妇女婚姻和家庭的主张	261
第四节 “做好妻子之外,还应有社会上独立的工作” ——对城市妇女教育和职业的主张	274
小结	282
结语	289
参考文献	300
附录	314
后记	330

引 论

自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创办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开始,中经 1934 年民国时期“杂志年”至今,期刊在中国已经有了近 200 年的发展历史。历经两个世纪,光阴荏苒,刊物层出不穷。与期刊的发展历史相比,史学界对期刊的研究则相对较少。2000 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期刊发展史》^①一书,在论述 20 世纪 20~30 年代期刊的时候,更多地关注共产党的期刊编辑活动、进步文学期刊的崛起及时事政治文化期刊的出现,而没有述及当时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刊物。

虽然近年来出现了大量以报纸为研究文本的论文和专著,但报纸研究毕竟不能代替期刊研究。期刊和报纸相比,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报纸以报告新闻为主,而杂志以揭载评论为主,且材料之选择,报纸是比较一般的,而杂志是比较特殊的。……报纸之论说(article),对于时事表示临时的反映;杂志之论文(essay)则以研究对于时事之科学的解决,且杂志之能

① 宋应离主编:《中国期刊发展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力,乃在问题自身之解决,是尤有卓识也。”^①报纸每日出版,迅速、及时而快捷地报道事实和发表言论,但报纸制作时间比较匆忙。期刊在报道新闻事件和发表言论的速度上,不及报纸,但期刊容量大,制作时间从容,对事件和言论的报道可以考虑得更周密和翔实,可以历史地和系统地记录某一事件,同时解释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动向,论述更为深刻、透彻,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思考余地和更广阔的观察视角。^②杂志“具有相当深厚的解释功能”,是“一直把兴趣主要放在我们称为‘因果关系’上——解释社会及其各部分,预测发展趋势,并把零碎的事实联系起来,阐明新闻的意义。换言之,杂志是伟大的注释家”^③,所以通过对特定时期期刊的研究,可以获取当时社会的政治观念、文化理念、伦理变迁、价值观念、审美观念、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诸多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的走向。因而,从期刊入手来研究某时期的政治、文化及社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撰写深受革命史范式的影响,即围绕着革命这个中心来撰写,与革命无关或不利于革命的事件都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是丑化,因此许多历史事件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盲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视野的扩大,人们重新发现丰富、生动而复杂的历史。许多学者认识到历史并非是单线的历史,而是有多个侧面、多个维度发展的历史,因此,一些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② 宋应离主编:《中国期刊发展史》,第2页。

③ [美]梅尔文·德费勒(M. L. DeFleur)、[美]埃弗雷特·丹尼斯(E. D. Dennis):《大众传播通论》,颜建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历史问题重新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内。笔者受现代化理论的启示,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期刊《论语》是民国时期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其中蕴藏着民国政治、文化及社会变迁的因子,通过对该刊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民国社会变迁,因此有独立考察的价值。又因为《论语》是民国时期大众文化传媒的成功范例,所以厘清该刊的宗旨、理念、特色和经营方法,可以为当今大众文化传媒业提供借鉴。

一、本论题的研究现状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兴起了一股“幽默小品文”的热潮。随着幽默刊物的大量出现,诙谐的文学作品相应而生。鲁迅就曾“用‘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①来形容这一时期幽默和小品文流行的盛况。究其源头应始于1932年林语堂主编的《论语》的创办。林语堂也因此获得“幽默大师”的称号。朱光潜曾说:“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②而《论语》就是这样“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其对民国时期的文坛和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之后,林语堂等人又创办了《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并以此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提倡“幽默小品文”的文学派别——“论语派”。

自从1944年林语堂离开祖国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40多年时间里,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林语堂,即便在《中国现代文

① 鲁迅:《花边文学·一思而行》,见《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9页。

② 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辑徐先生》,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页。

学史》里偶然提及,也被说成一个反面人物。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思想文化领域也冲破禁锢,学者们跨出“热衷政治”与“冷淡政治”的二元思维怪圈,开始以理性和多重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西方学术界开展的“文化研究”、“知识分子研究”以及“现代化”、“市民社会”等等新的理论和观念,给国内学术界带来强烈的震动和刺激,学者们开始尝试利用这些研究问题的新视角、新理论来研究和阐释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问题,林语堂及其作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被关注的,其积极方面也开始受到肯定。与此相关,对《论语》的研究也随之兴起。

(一)《论语》半月刊研究

1.《论语》本身的研究

对《论语》的研究始于对其做出公允的评价。《论语》创刊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该刊公然提倡“不谈革命”、“幽默闲适”,这被许多人认为不适宜于当时抗战和革命的需要,因而遭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作家的严厉批评。这种批评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对该问题的研究。新中国建立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几乎无人涉足《论语》的研究。虽然20世纪50年代中期曹聚仁在香港出版了回忆性的著作《文坛五十年》中,对《论语》给予了公允的评价:“林语堂提倡幽默,《论语》中文字,还是讽刺性质为多。即林氏的半月《论语》,也是批评时事,词句非常尖刻,大不为官僚绅士所容,因此,各地禁止《论语》销售,也和禁售《语丝》相同。”^①但是因为当时这本著作的印数和发行范围有限,

^① 曹聚仁:《〈人间世〉与〈太白〉·〈芒种〉》,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71页。

内地的广大读者很少读悉。

中国内地学术界真正开始客观公正地评价《论语》是从施建伟《试谈前期的〈论语〉半月刊》^①一文开始的。作者根据《论语》的创作实践,探讨了1932年9月16日至1934年9、10月间《论语》的思想倾向以及相关问题,指出从主编林语堂的政治态度和主要撰稿人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来看,前期的《论语》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不能笼统地把《论语》斥之为“引诱青年逃避现实,起了麻痹人民群众的作用”的毒草;直至1934年9月16日林语堂在《论语》第49期上发表了《四十自叙》之后,该刊才公开走向反动。施文首次提出将《论语》分前后两个时期进行研究,充分肯定其前期的进步作用,使该问题的研究走出了以往全面否定的误区。

此后学术界展开了对《论语》的创刊过程、宗旨、编辑及文体风格等基本问题的探讨。这类文章共有7篇。1988~1990年期间,曾与林语堂携手创办《论语》的章克标老人,在香港《明报月刊》和《读者良友》上分别发表了《林语堂》^②、《闲话〈论语〉半月刊》^③等文章,后又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林语堂在上海》^④,透露出了50年前自己和林语堂的一些逸事及《论语》的情况。曾经与邵洵美合编过《论语》的林达祖,也写了回忆性的文章,讲述了他与邵洵美合作的过程、《论语》名字的由来及其“造语幽默,亲切好读”、“广交朋友,各抒己见,群言堂”^⑤等特色。沈立行在《林语堂与三十年代

① 施建伟:《试谈前期的〈论语〉半月刊》,《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② 章克标:《林语堂》,《明报月刊》(香港),1988年第3期。

③ 章克标:《闲话〈论语〉半月刊》,《读者良友》(香港),1986年第6期。

④ 章克标:《林语堂在上海》,《文汇月刊》,1989年第10期。

⑤ 林达祖:《我与邵洵美合编〈论语〉之回忆》,《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

的〈论语〉半月刊》^①一文中,介绍了《论语》的诞生、“论语”二字的由来、杂志封面“论语”二字是谁的手迹、《论语》的“幽默”风格及该刊结局等相关问题。沙望孙在《也谈林语堂和〈论语〉上的一首打油诗》^②一文中,根据自己的回忆,对《论语》上刊载的一首打油诗的具体历史背景做出了解释。这些回忆性、史料性的文章,勾勒出了《论语》的基本情况,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

在此基础上,对《论语》的学术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此后又有3篇论文问世。郑建军、韦庆丽的《〈论语〉半月刊的常与变》^③一文,从办刊缘起、《论语》得名及文章选材等方面,看到《论语》“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论语’特色”,“亦庄亦谐、类型多样的幽默风格”及“灵活多变、风格多样的编辑特色”,从中总结出《论语》“常”与“变”两方面的特点。陈娇娥在《浅析〈论语〉杂志的文体风格》^④一文中,把《论语》刊载的文章大致分为四类:正宗幽默、纯粹笑话、杂文、政治幽默;并且指出,由于文体的多种多样,造成风格难以简单用“幽默”或“闲适”来概括,因而《论语》丰富的文化遗产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这两篇文章对《论语》复杂的文体风格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出《论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充分肯定了《论语》的研究价值。田焱的《〈论语〉杂志研究》^⑤一文对刊物的整体面貌及运作机制进行了考察,弄清刊物的基本面貌、栏目编排、营销与广告、

① 沈立行:《林语堂与三十年代的〈论语〉半月刊》,《纵横》,1999年第7期。

② 沙望孙:《也谈林语堂和〈论语〉上的一首打油诗》,《纵横》,2000年第3期。

③ 郑建军、韦庆丽:《〈论语〉半月刊的常与变》,《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④ 陈娇娥:《浅析〈论语〉杂志的文体风格》,《美与时代》,2005年第3期。

⑤ 田焱:《〈论语〉杂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6年。

编辑理念及作家群体等问题,把握住了刊物的编辑意图,为《论语》的整体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论语》与民国文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形成热潮,这为《论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视角。此时两套“论语派”刊物选萃^①的出版,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使学者们得以探究“论语派”刊物的内容及风格。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论语》,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征。

其一,从文化本身及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研究《论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谢其章^②的《历史的哈哈镜——〈论语〉杂志的“专号”》^③和郭晓鸿的《从〈论语〉鬼故事专号看现代中国的文化冲突》^④。前者着重对《论语》诸多的“专号”进行详细的介绍,认为“如果说《论语》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线,那么它的专号就是风景中一个曲径通幽的后园”;后者则通过对《论语》“鬼故事专号”的分析,得出精英文化与俗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潮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中国现代市民知识分子心灵

① 1997 年上海书店出版了《〈论语〉选萃》10 卷本,199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钓台的春昼——〈论语〉萃编》和《午夜高楼——〈宇宙风〉萃编》。

② 按:谢其章,上海出生,久居北京,是当代一位旧书刊的爱好收藏者。近年来勤于撰述,出版多部关于旧书刊的专著,计有:《漫话老杂志》、《旧书收藏》、《老期刊收藏》、《创刊号风景》、《创刊号剪影》、《封面秀》、《梦影集——我的电影记忆》、《搜书记》、《终刊号丛话》,被誉为谢氏“书影系列”。其中《创刊号风景》中提到《论语》的刊名来源。

③ 谢其章:《历史的哈哈镜——〈论语〉杂志的“专号”》,《中国编辑》,2003 年第 6 期。

④ 郭晓鸿:《从〈论语〉鬼故事专号看现代中国的文化冲突》,《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卷第 4 期。

矛盾的结论。二者都注意到《论语》所体现出的近代多种文化的冲突,并将该刊放入宏大的文化视角中去研究。

其二,援用“市民社会”理论、“大众文化”理论来研究《论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郭晓鸿的《现代市民话语的文化形态——〈论语〉杂志研究》^①和《〈论语〉杂志的文化身份》^②,以及陈娇娥的《论语:现代中国幽默的发源之地》^③。《现代市民话语的文化形态——〈论语〉杂志研究》一文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学术切入点,从“市民话语”角度对《论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做出考察,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四”的启蒙精神依然是新文学的中心;《论语》式的启蒙更具备现代市民社会所要求的世俗性、民间性和现代性,更能反映现代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常态表现。《〈论语〉杂志的文化身份》则鲜明地指出《论语》杂志是一份由中国现代市民知识分子创办的,代表中国现代市民知识分子文化趣味、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的刊物,它表现出的不中不西、不雅不俗却又中又西、又雅又俗的独特风格,与当时上海市民社会的文化形态有着同构的关系,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表现形态。《论语:现代中国幽默的发源之地》一文则认为,《论语》始终以“老百姓立场”自居,因而是一本真正的大众刊物;由于撰稿人基本上是“独立经济收入”的工薪阶层,“使他们有能力与社会主流保持着疏离感”,因而“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了一种立场的中间性”。上述几篇文章的作者都敏锐地察觉到了《论语》的市民气息和大众化倾

① 郭晓鸿:《现代市民话语的文化形态——〈论语〉杂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01年。

② 郭晓鸿:《〈论语〉杂志的文化身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③ 陈娇娥:《论语:现代中国幽默的发源之地》,《厦门大学》,2005年第4期。

向,试图合理地运用“市民社会”理论、“大众文化”理论来解读《论语》,并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研究态度,重新审视《论语》,力图还原历史事物本来的场景。

3.《论语》与民国文学

还有许多学者从文学的角度来思考《论语》的价值。《论语》除诗歌、散文、小说、小品文之外,还包含大量具有传统特色的对联、联话、笑话、寓言、竹枝词、打油诗及西方漫画等等。刊物始终保持一种幽默的风格,给民国文学带来一股“闲适”、“幽默”的文风。

首先,指出《论语》引入了英国式的幽默。杨义在《中国新文学图志》中论及《论语》时指出:“《论语》试图把英美式的幽默引入中国,这用意无可厚非,其用力不谓不勤,其效果也相当可观。但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正值民族危亡之际,不绝于耳的枪炮声没有给英国式的幽默提供多少超越的空间,刀光剑影的政治风云也使自由主义者无法自由选择。”^①

其次,将《论语》纳入“海派文学”。许道明在其《插图本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认为,《论语》的幽默文学,“表现了一种惟‘海派’才有的游戏规则,用商业文化来说明颇合适,它的散逸、精巧和实用享乐性,是一种参与和创造兼备的现代娱乐文学”^②。俞王毛则认为,以《论语》为代表的林氏刊物发展了海派文学,“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结合,从学养文化方面另辟一途,获得了独特的审美价值”;该刊的出现使“海派文学从此走上亦庄亦谐、亦俗亦雅的稳

^① 杨义主笔,[日]中井政喜、张中良合著:《中国新文学图志》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

^② 许道明:《插图本中国新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页。

健发展之路”^①。

再次,提出《论语》是趣味文学的代表。赵海彦在其《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一书中认为,林语堂主编《论语》期间,“着力进行了‘幽默’文学和‘闲适’文学的理论建构,企图以此为基础,重建轻松、趣味文学写作与阅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②。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指出了《论语》“幽默性”、“趣味性”、“娱乐性”的特点,而且一改现代文学史上对《论语》的偏见,充分肯定其在民国时期文学史上的贡献。

总体上来说,对《论语》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研究的重点是该刊的性质和评价问题,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施建伟的《试谈前期的〈论语〉半月刊》;90年代后期至今,主要从“文化角度”思考该刊的价值,充分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郭晓鸿的博士论文《现代市民话语的文化形态——〈论语〉杂志研究》。

(二)关于“论语派”的研究

文学界还从文学流派史的角度,来研究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为活动中心的“论语派”,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论语派”的定性与定位

关于“论语派”的研究也和《论语》一样,经历着一个由全面否定到逐渐肯定的过程。因林语堂等人曾遭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作家的批评,所以“论语派”在文学流派史上一直处于被批判的

^① 俞王毛:《林氏刊物与海派文学》,《美与时代》,2005年第12期。

^② 赵海彦:《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地位。

直至1979年陈金淦发表了《评“论语派”》^①一文,“论语派”的研究工作才开始艰难的复兴。该文作者认为,“论语派”始终坚持“中间立场”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办刊方针,充分体现出了当时士大夫式自由资产阶级文人的精神状态;并首次提出要正确评价“论语派”,使该问题的研究走出了以往全面否定的误区。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该文仍然带有相当浓厚的阶级分析色彩,但以此为转折点,有关“论语派”的研究渐趋客观和理性。

在此基础上,学者也开始关注“论语派”与“语丝派”、“左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施建伟先后发表了《语丝派的分化和论语派的歧途——语丝派与论语派比较研究之一》^②、《论语派及〈论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③及《“左联”与论语派》^④3篇文章。作者认为从学术流派演变来看,“语丝派”与“论语派”有前后继承的关系,“论语派”和“左联”并不是简单的“论敌”关系,鲁迅对林语堂的批评是语丝派内部的论争,而不是敌我斗争。以《论语》为主要阵地的“论语派”依然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带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派别,它的动摇性和矛盾性,正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

另外,还有学者如唐弢、万平近等人,以林语堂研究为学术切入点,并对“论语派”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林

① 陈金淦:《评“论语派”》,《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

② 施建伟:《语丝派的分化和论语派的歧途——语丝派与论语派比较研究之一》,《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③ 施建伟:《论语派及〈论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

④ 施建伟:《“左联”与论语派》,《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

2. “论语派”的风格与内涵

时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者们开始试图援用“文化研究”、“市民社会”及“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来思考“论语派”的问题,使该问题的研究进入迅猛发展时期。

对“论语派”的研究打破坚冰,迅猛发展肇始于对其文体风格的评价。20世纪90年代后期,各种新编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和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的专著,像雨后春笋一般相继问世。这些专著在提及“论语派”时,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论语派”所提倡的幽默、闲适小品文的积极意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提及“论语派”的散文风格时说:“30年代前期,文坛上曾风行过幽默小品与闲适小品,活跃了散文创作,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的路子,是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引人注目的现象。”肯定了“林语堂的多数小品文都追求幽默的情味”,“融会了东西方的智慧,从学养文化方面另辟一途”^①,但也看到林语堂的小品文脱离现实和远离主流文学的不足。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讲述“论语派”时,从文化取向、文学创作等方面分析“论语派”,高度概括出“论语派”的思想文化取向的同时,将其“闲适”、“幽默”、“性灵”文体风格做了详细的说明。廖超慧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一书中,在论述左翼文学主潮与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论争时,指出两派论争的原因除了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择取不同外,还强调了两派审美追求上的差异,“鲁迅主要是从审美的时代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397页。